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特刊

2003/11

本期專題

捍衛公共服務， 反對削資，反對私營化

- | | |
|-------------------|-------------------|
| 1 大學也瘦身 | 9 大學教育與「用者自付」的欺騙性 |
| 3 全球化與香港的房屋問題 | 11 私營企業必然比公營的有效率？ |
| 5 維護選擇自由還是削減老人福利？ | 12 反社會的市場 |
| 7 全球化下的電訊業勞工 | 16 私有化還是社會化？ |

大學也瘦身：肥肉都長在哪裏？【潘文翰】

在政府高喊「減赤」的口號下，明年本港各所大學都被削減一成的資助。減幅還不包括教職員減薪、削減副學士學位及修課碩士課程的資助（此即為「三包」），所以科技大學估計總的減幅高達百分之二十八。支持削減資助的都會引用今年審計署對大學開支的報告，指教職員薪酬及福利比美英更優厚，大學中存在浪費資源的情況等。既然一方面政府又有赤字預算，大學又有減少開支的空間；削減大學的資助就變得理所當然。

然而，我們首先得釐清一個簡單的概念：即使大學的部份開支存在浪費（假設審計署的報告是完全成立）亦不等於大學的總體經費過多而要被削減。當然我們需要一個詳細的研究去分析大學的資助是否足夠，但某些「反証」都引發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數天前中大及港大都表示，由於缺乏研究資金去購買



所需儀器，他們被迫拖慢研究非典型肺炎疫苗的進度。現時教學用途的資助佔整體資助的四分之三，而研究方面的資助只有四分之一，這個亦可能是導致朱經武所說的，香港的科研環境不及歐美。此外，根據大學教學資助委員會的數據，政府對大學教育的資助，佔政府的總體開支的比例，從九六九七年度的6.7%下降至零二零三年度的5.9%。這個數據跟董建華

不斷提倡的「知識型社會」是否存在矛盾呢？

有某些評論將矛頭直指對學生的資助：一說現時每個大學生每年成本平均要二十多萬，但現在學費只佔成本20%。在今天大學教育普及的年代，政府實不應該要納稅人補貼那麼多金錢。這種說法其實跟其他公營部門，如醫療房屋減少政府資助的理據同出一轍：用者自付。對於這個近乎「鐵律」的理據，加拿大一位經濟學教授阿倫（Robert Allen）做了一個有關該國卑詩省的研究去反駁。他的結論很簡單但卻很有趣：學生其實已經支付他自己所有的大學教育成本，因為除了交學費外，他們畢業後工作所支付的稅金，加起來已經超過成本有餘。同時他亦指出，學生經過大學教育後，對社會及自己都帶來更多的財富。

雖然這只反映加拿大的情況，以香港大學畢業生每月只賺六七千元來算，他們能貢獻多少稅金也是個疑問。但這個研究提醒我們，現在我們不是「恩賜」香港的學子上大學，而是一種對人力資源的投資。認為納稅人不應該資助教育成本的人，無疑是短視的。加拿大增加大學學費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家長擔心子女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他們亦猛烈批評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的高等教育差不多是完全的用者自付，入讀熱門的學系要付高昂的學費，貧窮人家的孩子只好去讀一些出路較差的學科甚至根本就讀不起大學，這只會進一步減低社會階層流動和加劇貧富差距。



全球化與香港的房屋問題

【陳敬慈】

香港的房屋問題究竟和全球化有沒有關係？反全球化運動如何和本土的社運議題聯結，或是不需聯結？

回答以上問題首先要給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個定義。反全球化就是要反對市場霸道，反對財團壟斷。對市場的批判、對財團的反抗從來都存在；反全球化運動產生背景是世貿、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正在推廣全球統一市場，少數跨國財團走向全球範圍內的壟斷，社會運動需要全球的視野和不同地區之間的合作和經驗交流。

香港的房屋問題大概有三個範疇，分別是建築、供應和管理，三者都是社會討論的熱門話題。

1 房屋的建築：一直以來香港的建築都是全面的私營化、外判化，判上判問題嚴重，建築工人散工化，甚至自僱化，工作極不穩定。外判的價低者得，包工包料等原則，令樓房的建築質素缺乏保障，以至出現短樁樓事件。事件後，政府於2000年委任了以現任財政司長唐英年為主席的建造業檢討委員會，檢討報告書指出：「為了改善工程質素，必須杜絕沒有增值的多層分判制度。」報告也建議建造商直接聘用工人，提供安穩的工作，並指出香港建造業的工地意外率遠超出其他經濟發達地區的水平，1999年每1000名工人就有198宗意外。但政府並沒有具體措施令建造商直接聘用工人。建築是最多工潮發生的行業，工潮又幾乎全涉及欠薪，2002年就因欠薪引發警民衝突和警員拔槍事件。

導致勞工權益和房屋質素都惡劣的原因是建造業的徹底市場化，價低者得正是市場的基本原則。建造業



檢討委員會既可看市場自由化存在的種種問題，卻又反過來建議「在市場力量帶動下提升服務」。報告書更指出要令本地公司在海外市場佔一席位，批評本地建築業勞工密集和無意提升技術水平。

在世貿「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的談判中，港府作出25項市場開放承諾，其中包括建築及工程服務。GATS尚未落實，香港建築業現時已經十分開放，韓國現代、瑞典金門、法國寶嘉等跨國企業都是主要的建造商。GATS一旦落實，不但擁有高新技術設備的更多跨國企業可能涌入，淘汰就業機會，要求政府保障勞工也將變得更加不可能。

私營化和市場化已經成為影響世界各地的潮流，在財團資本的立場上，香港正是市場開放的典範；全球的潮流也反過來進一步推動香港的私營化，「大勢所趨」正是官商的口頭禪。我們正要揭穿市場化的神話，對抗市場至上的論述，並以此支援各地的反抗運動。

2 房屋的供應：港府於1953年起供應公屋，1976年推出低於市價的「居者有其屋」。1986年政府〈長遠房屋策略〉確定「以私人市場作主導」。1998年之前，房地產為政府提供了高額的收入，為地產商創造了巨額利潤。香港市民為地產商打工，變相交高稅。

香港能以超低的直接稅率享有多多年盈餘，是由於金融風暴前，賣地及投

資回報十分龐大，1997/98年是政府稅收的80%，但經合組織成員國只佔16%。隨著泡沫破滅，增加直接稅率，特別是引進累進利得稅，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卻以削減福利開支和公務員工資，推行外判、私營化，減低免稅額，甚至計劃引入間接稅去減赤。

在地產商的壓力下，2002年政府宣佈停建居屋，減少提供公屋。但另一方面卻資助首次置業人士，變相補貼私營市場。財團進一步壟斷小市民的衣食住行，住屋作為一種公民權再被剝奪。

是全球化還是本土的因素令房屋進一步私營化？本地樓市下跌和財政赤字的起點是金融風暴，而金融風暴是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國金融缺乏管制的惡果。另一方面，透過減少福利、公共服務私營化去減少赤字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的主張相吻合。在經濟衰退下，民間要求增加利得稅，政府的回應是資本



將因本地競爭力不足而外流。為什麼資本的流動變得如此自由？因為跨國企業在鼓吹，因為世貿、國基會、世銀等組織推動，因為各國政府都願意開放市場。所以，本土因素和全球因素息息相關。

3 房屋的管理：房屋署的外判於1987年開始，起初範圍包括清潔及維修，1998年後擴展至清潔和保安服務。外判導致工人薪金下降，工作量大增。樂施會2002年12月公佈的調查發現五成半清潔工人月薪更低至四千元以下；67%保安員工資在六千元以下，每天工作12小時。在工會的爭取下，政府2001年起陸續實行公屋保安服務兩更轉三更，8小時工作制，但並沒有限定最低工資，令工資下調了13%至21%。

外判導致原有穩定的公務員職位消失，1999年房屋工會大聯盟反對外判。但運動沒有得到一般市民的支持。政府以改善服務和減少開支為賣點，推銷私營化。居民傾向支持外判，部分源自社會對市場的崇拜，部份是對公營系統缺乏民主監察而出現官僚化的反應。私營服務的質素是否比公營服務好，存在很大的疑問。從居民的實質經驗看，部份人投訴外判後服務差了，部份人認為服務改善了，更多的人是覺得沒有大的差別。

承判商採用高壓管理手法，例如：扣薪、評分制、

不合理解僱等，或許能維持良好的服務質素。但是，在社會危機出現時，公營服務的優勢就顯示出來。在非典爆發期間，淘大清潔服務的私人承判商將清潔工人的工資增加至每天\$500，仍然沒有外判工人願意工作。食環署最後調動公務員進行清潔和消毒工作。公務員是穩定的工作職位，有合理的工作條件，工人對工作也更有使命感。

政府把工作外判的誘因在於減少開支和創造商機。房署顧問公司的報告（1999年2月）指出外判可節省42%至45%開支。港府GATS開放市場的承諾也包括大廈潔淨服務，現時香港的清潔服務同樣已經向全世界財團開放了。

公屋居民和基層工人的身份重疊。居民和保安員、清潔工人的利益表面上對立，但實質卻是相同的。過去幾年，隨著房屋署服務外判，公屋居民變得更加窮，而不是更加富有了。外判化使利益是從工人流向財團，而非基層居民。

港府主動地迎合市場化的潮流，以引入外資為榮。但跨國財團在香港作了甚麼？2001年地鐵轉換清潔服務承判商，原承判商服務系統(ISS)是世界最大的清潔公司。ISS企圖透過調動工作地點迫使工人辭職，工人罷工10天，爭取遣散賠償，財大氣粗的ISS不為所動，案件現仍在高院審理。



維護選擇自由還是削減老人福利？

——評「錢跟老人走」方案【林致良】

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去年十一月曾著文慨嘆「目前申請社署津助宿舍的長者無需接受資產和入息審查，一些有經濟能力的長者正接受津助院舍服務。」反而「最貧困無助的長者只能透過綜援計劃接受將價就貨而欠妥善的私院服務」，所以社署正在構思「錢跟老人走」的方案，使「獲得資助的可自由選擇他們喜愛的院舍入住」。據悉董建華即將在2004年施政報告中明確推出「錢跟老人走」。究竟「錢跟老人走」方案是否比現有老人院舍輪候制度更能維護老人的自由選擇權？新方案是否符合老人的利益？

根據社署一份非常簡略的介紹《體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資助安排》（2003年6月），社署打算改變過往市民年滿六十五歲便有權輪候老人院舍的制度，以後凡申請院舍的老人都要由政府審查資產和入息，按照申請人的經濟能力發放不同金額的代用券，申請人憑手上的代用券自己選擇適合的資助或私營安老院居住。政府表明只會全數額資助那些「最沒有經濟能力的長者」，凡證實有一定經濟能力（何謂有一定經濟能力？標準是什麼？子女有工開算不算呢？政府統統沒有清楚說明）的申請人，政府可能不會資助，或者只會資助部份住院費。社署說，這樣便能夠一方面有效運用資源，另一方面讓老人自由選擇喜愛的院舍居住。據說，這些好處都是拜充份利用（老人作為）「消費者主權」和發揮（安老院）「市場競爭機制」所賜。

資產審查 收窄保障範圍

如果政府給全港老人都發放足夠（至少不會比現在少）的金「錢」，由「老人」用這筆「跟」著他「走」的錢按自己的意願選擇某一間安老院居住，而全港安老院的服務質素和員工待遇都受到政府嚴格的監管，那麼，新方案似乎沒有什麼好反對的。可是，不要忘記，「錢跟老人走」方案是伴隨著對老人的資格審查

的。我們可以推斷，「錢跟老人走」的新制度是為老人資產審查而設的。現時老人不問資產多少和子

女入息多少，只要年滿六十五歲，便有權輪候入住各類安老院（包括資助護理安老院、療養院及政府買位的私營安老院）。這多少是一項老人普遍享有的福利權利、一種社會保障。可以想見，一旦實行資格審查，會有一部份老人所獲得的資助金額不足以支付安老院租金，甚至不獲政府資助，這部份老人的經濟負擔肯定會加重，而政府便可藉此推卸福利保障的責任。況且，所謂「有經濟能力」的長者，絕對不會是什麼大富豪；真正的富豪，通常都不會選擇入住老人院呢。總之，政府對老人搞什麼資產審查，不過是爲了削減大眾現時僅有的一點晚年保障。

市場競爭 劣幣驅逐良幣

香港資助（半公營）安老院的服務質素普遍比私營安老院好，這是連社署也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箇中重要原因，偏偏不是資助安老院發揮了什麼「市場競爭機制」，而是它基本上按照**非市場邏輯**運作，從而多少擺脫了市場競爭的壓力：例如安老院宿位由政府按長者需要統一分配，安老院的「客源」得到政府保證，院舍的設備、人手編制和員工待遇都受到政府的規管。正因為資助安老院具有的**非市場營運方式**，使它有可能提供較好而且較穩定的服務。

「錢跟老人走」方案實行後，資助安老院爲了要在「安老服務市場」上「搶客」，很可能採取：

1. 增加收入，吸引「中產



住客」入住，造成一間安老院出現待遇不同的兩類住客，多付錢的受到較好待遇，少付錢的待遇較差，福利服務的平等精神蕩然無存；

2. 做好院舍外表裝修，吸引「顧客」入住。至於院舍內裡服務，特別是對人的關懷、輔導服務不甚重視。現時不少所謂五星級私營安老院，其實只是五星級裝修；
3. 削減院舍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導致裁員減薪。在社署已經實行「一筆過撥款」（資助封頂），資助安老院人手編制和員工工資不再受政府規管的情況下，更加容易造成公私營安老院的員工待遇向下比賤。

「錢跟老人走」實質上就是把市場競爭的機制直接植入資助安老院服務中，造成資助安老院與私營安老院之間，甚至各間資助安老院之間的惡性競爭。最後真正得益的只是政府（推卸了提供福利責任）和私營安老院集團（增加了商機），而不是老人。事實上，「錢跟老人走」是一種隱蔽的安老服務私有化的方法，因為它表面上好像處處為老人家著想，實際上只方便私營安老院逐漸蠶食非營利性質的資助安老院，讓前者逐漸壟斷安老服務。

有人說，讓老人運用消費者權利，便能夠有效淘汰質素差的院舍，可是上面分析得出的結論恰恰相

反。關鍵在於老人作為弱勢社群並非普通消費者，他們比普通人更難獲得充分的安老院市場信息和具備足夠的能力作出選擇。在財團壟斷民生的今天，連普通消費者都不容易清楚知道某種食物是否有毒，更遑論體弱長者了。

當然，我們不是否定老人有選擇權利，相反，我們認為應該大大擴充安老院舍服務，而且應該讓老人有份參與有份決定安老政策。而「錢跟老人走」所謂的老人權只是縮窄為僅僅是市場上的選擇自由權。根據上面的分析，這種選擇自由權往往是虛幻的。

分化老人 理據不盡不實

社署為了推行安老院市場化，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它說，因為不設資產審查，所以窮困老人被迫入住私營安老院，資助院舍宿位卻給有經濟能力的老人霸住。你不能入住資助院舍嗎？罪魁禍首可不在政府，是那些有經濟能力的老人啊！資產審查勢在必行啊！其實，只要興建足夠的安老院，滿足所有老人需要，豈不就解決問題了？為什麼社署偏要挑撥老人互相忌恨呢？

現時安老院舍服務不是盡善盡美，無需改革。不是的。安老服務需要改革，但是搞什麼資產審查、市場競爭，絕不是改革，而是改衰。因為「錢跟老人走」是一種隱蔽的福利服務私有化，所以大眾更需要提高警覺，認清漂亮口號背後的真象。



全球化下的電訊業勞工

——「國際工會網路 (UNI) 2003 年世界電信大會」紀要

【邱毓斌】(英國艾賽克斯 Essex 大學社會系博士班)

2003 年 6 月，國際工會網絡(Un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UNI)於克羅地亞首都召開「世界電信大會」，此係 UNI 於 2000 年成立之後的第一次電信大會，共有來自四十國兩百六十名代表與會。會中針對近年來國際電訊產業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對電信業勞工所產生的衝擊，進行了許多的討論。本文針對其中幾項重要的決議進行摘要整理。

※血淋淋的教訓：紐西蘭電信

紐西蘭電信在 1990 年完成私營化，當時是由兩家美國電訊業者 Ameritech 公司以及 Bell Atlantic 公司買下。私營化四年之後，也就是 1994 年，原本 14,000 名左右的員工，裁員裁到只剩下 9,000 名左右。當時，這九千名員工曾經進行了七天的罷工，以爭取新的集體合同。然而，這兩家國外的電訊公司注重的只是股價的表現，對於員工權益以及電訊服務並不重視，因此事情越演越糟。

僅僅在一年之後的 1995 年，工會在公司全力的打壓之下，無法生存而宣告解散，會員遂由另一家工會接手。1996 年，紐西蘭電訊公司拒絕簽訂任何新的集體合同。

1998 年，紐西蘭電訊此時只剩下 8,000 名員工，更糟的是，這裡頭只剩下兩千名是正式的員工，其他均已成為合約工。在同一年，Ameritech 公司賣掉其所有股份，大賺一筆。2000 年，所有技術性的工作幾乎都已經外判，我們所能想像到的工程、線路、研發、設計等等的工作都是採取外判而由承包商執行。2002 年，Bell Atlantic 公司（已改名 Verizon）也賣掉所有的股份，賺取高額利差。

現在，紐西蘭電訊只剩下一千不到的正式員工，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採取外判。員工薪資水平相對來說比十年前低，只有少數享有退休年金，職安問題不

斷，更沒有所謂的職前或在職培訓。相對於員工的悲慘遭遇，公司的高層經理年薪卻節節調高。而對於使用者來說，紐西蘭電訊現在是全世界電訊費率最高的國家，而電訊普及服務的品質卻逐漸降低中。今年六月最新的消息是，紐西蘭電訊與法國電訊公司 Alcatel 簽訂一個五年的合同，Alcatel 將接管紐西蘭電訊，所有員工將成為 Alcatel 電訊的員工。換言之，紐西蘭電訊極有可能從此走入歷史。

在此次大會中，進行此項專案報告的人是 UNI 電訊委員會的秘書長尼爾·安得森，他沉重地呼籲：「我們絕對不能再讓這樣的情形發生了！」

我們必須要了解，外資進入絕對是著眼於利潤，而非服務，這對電訊員工以及所有國民，都將帶來極大的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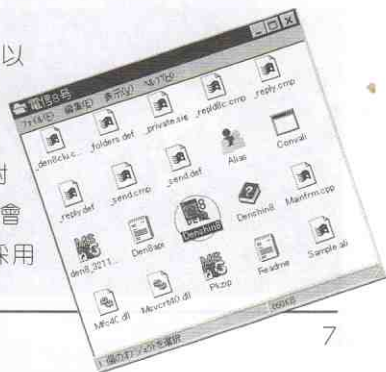
※電訊業與電訊勞工的未來

在六月二十七日會議中，與會代表討論全球電訊產業發展對於電訊業勞工權益的影響，來自歐、亞、非、美各洲等十餘國電訊工會代表上台分享各自的抗爭與組織經驗。總結來說，UNI 電訊秘書處提出三個長期工作方向：「一、推動普及電訊服務；二、有優質工作才有優質服務；三、敦促全球電訊業財務透明化。」以下就這三點進行扼要說明：

一、推動普及的電訊服務(Universal Services)

UNI 希望所有的會員工會可以在各國去遊說電訊業應該是以「普及服務」為基礎，而非一味地以營利為目標。

這道理很簡單，以追求利潤的公司，自然對於員工權益大有損傷，另一方面，對於所有市民來說也不會有好處。相對地，採用



專題

捍衛公共服務，反對私營化

普及服務作為發展準則，不僅可以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更可以為市民提供良好的電訊服務。

二、有優質工作才有優質服務(Quality Services, Quality Jobs)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通訊業工作是遍佈在許多小規模的服務公司之中，這些勞工肩負了第一線的服務工作，但是他／她們的工作通常是不穩定的、勞動條件低的，而且通常是沒有工會保護的。

因此，UNI 希望各國的電訊工會可以加強組織這些勞工，將這些勞工納入工會的保護，提昇這些勞工的勞動條件。UNI 相信，在要求優質的服務之前，必先得要提供給勞工好的工作待遇與福利。

三、敦促全球電訊業財務透明化(Financial Transparency and Disclosure)

正如我們可以從紐西蘭電訊的例子看出，國際電訊資本的移動是全球性的，另外，像民營化後的巴西電訊是由美國公司取得經營權，克羅地亞、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家的電訊公司的主要持股者是德國電訊，俄羅斯電訊則是由荷蘭電訊與英國電訊分食。

這些跨國電訊公司其國際化程度越高，其財務透明度卻越低。員工與股票持有者並無法清楚了解公司未來發展與走向，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亂的新投資方案與節節升高的專業經理人年薪。因此 UNI 呼籲在各國國內敦促電訊公司財務透明度要充分讓社會大眾了解，在國際上則希望可以透過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或世界電訊聯盟加強電訊業的財務透明度。這樣不僅保障社會大眾投資人，也更能保障員工的工作權。

附帶一提的是，這些跨國電訊公司四處東兼西併，導致原來分屬不同國家的勞工反而遇見了同一個老闆。因此，UNI 現在也希望能夠和這些跨國公司去簽訂國際性的集體合同，比如德國電訊是 UNI 目前的第一個目標，

UNI 希望可以與德國、捷克、克羅地亞、匈牙利等國的電訊工會一起並肩作戰，

爭取到和德國電訊公司簽訂跨國的集體合同。隨著資本全球化的過程，這將是國際電訊業勞資關係的一個新發展。

※ 小結

透過以上這幾點，我們可以了解國際上電訊工會的一些主要發展策略：首先，在電訊政策上，鼓勵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供社會更好的電訊服務，也藉此爭取與一般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上；其次，工會要能結合更多的電訊業從業勞工，以壯大工會自身的力量；最後，對於電訊資本要加強監督的能力，以平衡已經過度傾斜的勞資關係，也藉此結合電訊業的股票持有者與工會站在同一陣線。

最後，此次大會通過對三個國家的電訊工會抗爭聲援案：台灣、哥倫比亞以及辛巴威，全場代表起立向這三國的電訊勞工致敬並鼓勵。大會主席美國電信工會 CWA 的賴瑞，柯亨並要求所有國際工會同時發函台灣的總統陳水扁以及行政院長游錫坤，抗議台灣政府漠視工會聲音，執意推動私營化。台灣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與代表團成員上台致詞答謝並高唱「團結歌」，獲得大會熱烈掌聲。

※ 後記

9月23日台灣中華電信工會發起反對私營化抗爭，動員超過 5000 名會員，和超過 1000 名聲援勞工，在立法會門口抗議迫使立法院各黨團簽署工會提出的訴求。現場氣氛激情而熱烈，不斷高喊「尊嚴」、「反對財團釋股」等口號。工會有三點主要的訴求：第一，捍衛全民資產；第二，反對財團治國；第三，捍衛員工權益。香港、韓國、美國等地工會也派出代表前往聲援。

UNI Telecom website:

www.union-network.org/telecom

UNI APRO WEB PAGE:

<http://www.uniapro.org>



大學教育與「用者自付」的欺騙性

【李言成】



各國政府近年來都致力在基本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中推行「用者自付」，說這才是避免濫用服務，提高效率的辦法。世上哪有免費午餐？所以，只要是惠及個人的福利，成本都應由個人負責。他們的口號是：不要依賴政府！

用者少付，付者少用

對青年一代和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有深重影響的，就是政府和工商界全力在公立教育實行「用者自付」的原則。直到九十年代初，大學學費還很便宜。以後政府政策才大幅改變，處處講求收費與成本掛鉤，變成中學畢業生有錢或有舉債能力的才能接受專上教育，無錢就最多去唸 IVE 而已。

那些為政府辯護的政客，學者常常說：

基礎教育可以由政府承擔，不分貧富，人人有份。但專上教育不同，那是一種個人投資；大學畢業生將來的較高收入，也只是自己得益。既然如此，這種個人投資所需的資金，理所當然也該由個人負責。

這種謬論之所以錯，是因為：

（一）首先，究竟誰是專上教育的用者？是大學畢業生自己嗎？不，至少不是這樣簡單。如果他大學畢業之後自己開業做老闆，例如法律系學生畢業之後經過幾年實習，自己開設律師行，那麼，我們就可以勉強承認他是自己的大學教育的主要用者和得益者。衆所周知，這種大學生祇是非常少數。絕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將來都需要為老闆打工，做他們的搖錢樹。所以，大學教育的真正用者，是老闆階級。當田北辰擔任教資會主席的時候，就是他說出這句話的。那麼，專上教育的全

部經費由老闆階級負責不是天經地義嗎？有甚麼理由主要由大學生負責呢？

（二）畢業生的薪金並不全歸他個人所有，因

為他要納稅；人工越高納稅便越多，所以在這方面他也在貢獻社會，而且在往後幾十年都這麼貢獻，直至退休。既然社會也取之於他，而且所取的是他的全部教育經費的許多倍，所以一開始要政府負擔他由小學至大學的教育經費，也是理所當然。

（三）上述謬論的要害是把專上教育的作用完全縮窄為一個它能夠為學生賺多少錢的問題。可是這純粹是商人的狹窄視野。專上教育不是純粹的職業訓練，不能單從金錢著眼。專上教育的目的首先是為了促進社會的整體科學、文化、學術的水平，為社會培育出百花齊放的人材。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個有成就的大學生不單使自己受益，而且使社會受益。科學、文化、學術上的成就尤其如此。試想，一個愛因斯坦，或者一個貝多芬，就能為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多大貢獻？社會必須在提供教育方面——從基礎教育一直到大學——毫不吝嗇，才能既造福個人又能造福社會。

不同的用者，不同的付出

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用者」：億萬富翁與窮光蛋；市中心住戶與邊遠地區住戶等等。要各種各樣的「用者」都付相同費用，那才是最不公平。若費用同成本完全掛鉤，更是百倍不公平。急症室實行「用者自付」，李嘉誠之類所付出的只佔其收入的億萬份之一，但窮光蛋卻可能是其收入的七成八成。

專題

捍衛公共服務，反對私營化

「用者自付」其實是統治精英欺矇老實小市民的大話，因為在所謂「用者」中，普羅大眾占絕大多數，而他們在打工生涯中早已付出多而收獲少；他們為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或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服務，可是在新增財富中工資與商界利潤之比多年來卻不斷下降〔註〕，反映他們多勞而少獲，而高官巨賈卻少勞多獲，甚而不勞而獲。後者所賺的利潤或者收入簡直是全世界最高，所交的稅率卻幾乎是全世界最低。但高官巨賈還嫌普羅市民享有福利太多，還要強迫他們再為醫療、教育、房屋、退休金多掏腰包。這不過是再度搶劫罷了！

提供低廉甚至免費的基本服務，本來是政府應有責任。像供水、醫療衛生、教育、照顧弱勢社群等，不論貧富，不論有無工作及交稅，都應有權充份享用，因為這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也是人類社會穩定的前提。政府一直依靠稅收來支付有關服務，現在稅收照拿（低收入工人即使沒有交薪俸稅，也有交種種間接稅或變相的稅收，例如高地價和高樓價），公共服務及福利開支就日漸縮水，把責任推卸給人民，試問公義何在？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用者自付」論暗含一個前提，就是使用了公共醫療、教育、公屋、公共服務等等的人，得益只歸自

己，所以理所當然要負擔全部或大部成本。但這個前提根本錯誤！在上述領域，個人得益之外社會也得益。個人衛生和健康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一幢大廈污水渠的好壞影響整個社區甚至社會；越多低下階層青年人能接受高質素、低學費的大學教育，等於大大提高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和文化活力；有了基本生活保障能使人有起碼的安全感、減少焦慮，整個社會也就比較精神健康。在預防及治療疾病上，尤其需要低廉而優質的公共醫療制度，因為許多疾病的引起根本不是個人責任，所以風險應由整個社會負責。總之，醫療、教育、基本住房、退休制度、社會服務等從頭起就應被視為公共利益，而不能視為謀利生意，所以在上述領域不應該實行私有化或商品化，相反，只應該實行社會化，意思就是營運的成本由整個社會負擔，並按人的需要而不是按支付能力來分配。

統治精英鼓吹的那套「個人幸福完全是個人責任的思想」，其實只是專門餵飼普羅大眾的迷湯。對於富豪階級，他們唱的卻是另一支曲。無論是殖民地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一樣致力為大財團承擔投資風險。大家都一樣心甘情願去繼續保證那本來就必賺的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的利潤；都不怕用千億公帑拯救股市，實行「投資利潤私有化，投資風險社會化」。所以，我們今天主張醫療、衛生、教育、失業保障等全面貫徹社會化原則，不過是要求平等對待普羅大眾罷了。

2003年9月23日



註 香港雇員工資在附加值中所占比例，從1970年的57.1%下降為1994年的48.8%，而同期利潤所佔的比例就從42.9%上升為51.2%。如果考慮到兩類的人數非常懸殊，就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

私營企業必然比公營的有效率？

【廖化】



專題

捍衛公共服務，反對私營化

高官巨賈和主流經濟學家，無一不答：「當然囉！」

實際上不是這樣簡單。關鍵是，何謂效率？如何量度？

香港運輸局在1999年底向立法會提交一份文件以便證明地鐵私有化的好處。文件羅列六個國家的鐵路在私有化後多數多賺了錢或扭虧為盈。結論自然是私有化好了。

利潤掛帥，損人利己

問題是，怎麼能夠把利潤當成效率的唯一標準？提高利潤有很多方法，有些方法可能利大於弊，有些方法卻弊大於利。利用壟斷地位不斷加價，或者不斷降低服務質素，用損害消費者的方式去增加利潤，這純粹是損人利己的辦法。由於公營事業多為公用性質，具有天然壟斷的特點，所以在私有化後通過上述途徑去謀利是挺容易的。上述報告的六國包括英國。但英國鐵路之所以盈利增加，相當部份正因為降低安全標準。而結果就是造成去年的重大撞車事故。可見單靠利潤來判斷企業表現是多麼不公道。

如果要衡量效率，首先應該顧及生產效益這個標準，而不是單看利潤，因為前者的提高意味實質財富的增加。利潤提高卻不一定意味實質財富的增加。

怎樣衡量生產效益？最普通是看勞動生產率，即產出量與投入的勞動量之比。但是單看這點也不夠可靠，所以經濟學家還要考察其他標準，例如全要素生產率，附加值等〔註1〕。一位英國學者考察了十一間私有化的前公營企業，發覺一個有趣現象：在私有化後，企業表現極不均一。往往是這個指標提高了，另一個指標卻下降了。全要素生產率更是升少跌多。只有利潤率一項，上升的比下降的明顯多出一倍以上。（見表一）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發現。這些研究證明所謂私營一定優於公營根本不符合事實。

柚子與蘋果之比

硬要私企同公營相比，有

時像是拿柚子同蘋果相比。私企唯

利是圖，不僅可以不負任何社會責任，

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犧牲社會利益，例如工廠排出廢水廢氣、污染環境。現有的公營企業固然有許多缺點，但它往往要負起社會責任。房委會的私營化顧問報告指責房署的管理成本比私營高出許多。他們忘記了，房署員工所身負的責任，是私營的所無的，例如處理調遷、調解住戶糾紛、轉介個案給社署、又或是執行房屋政策，包括處理雙倍租個案等等。水務署呢，它有責任向遍遠的地方供水，盡管為此每年支出1200萬，但是收到的水費不足200萬元，是虧本生意。從資本家的錢眼看，虧本生意沒人做。然而，公營事業的宗旨恰恰不是唯利是圖，而是按需供應。這種虧本生意對維持人類社會的凝聚力，進步及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硬要公營事業同私企在盈利上看齊，根本就是借口搞私有化從而推卸責任。

利潤到什麼人袋裡？

那些高唱私企生產效益優於國企的人，故意不談另



表一、英國十一間國營企業在國營時期與
私有化後各時期的經濟表現的比較

按各種指標計算	上升	下降
勞動生產率增長	19	20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12	28
附加值	23	17
利潤率	28	12
按四大時期計算	上升	下降
私有化前	24	15
私有化後的短時期	20	24
衰退期	17	23
最近期	21	15
總計	82	77

備註：本表來自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P.215（見參考資料）。這個表是原書前一個表的簡化。原表仔細羅列十一間公司在四大時期的四個指標的升降，所以平均而言每間公司都有16個數據。明白這點就能明白為何上升與下降的數字遠超過十一間公司之數。

一種效益——分配效益。公營事業私有化之後，利潤提高了，可是，這些利益落到什麼人袋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首先落到企業董事手裡。本來，私人大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董事們酬金過高，犧牲了廣大小股東利益，早已為人批評。公營企業私有化後，同一現象只有變本加厲。第二類受益人是工商界。試想，地鐵私有化，憑其半壟斷地位，當屬優質大藍籌。大批買下這些股票的資本家，等於買下一盤幾乎必賺的生意。另一方面，工人卻首當其衝。私有化幾乎必然帶來裁員（這是提高盈利的不二法門），結果一面是失業員工陷於赤貧，另一面則使在職員工陷於身心俱損（因為要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私有化有利誰不是明如白晝嗎？

惠及消費者？

政府和工商界會這樣反駁：「但至少私有化可帶來競爭，從而惠及消費者呀！」

這是事實，但是，是個別情況的事實，而非普遍情況。

普遍情況可以有幾種：第一，對於那些具天然壟斷的行業，如水、電業，私有化後根本不可能會帶來多少競爭，所以價格根本不會下跌很多，有時甚至還要

上升。第二，對於那些不具或少具壟斷性的行業，如郵政、電訊等，私有化後可能會暫時引起激烈競爭及價格下降，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優勝劣敗的淘汰下，往往只剩下幾間大公司，並照樣實行寡頭壟斷，這時價格就會上升。

還有，我們籠統地使用「消費者」這個詞，很容易上當受騙。消費者有個人消費者與工商業消費者之分，你說的是哪種？英國私有化的經驗證明，公營企業在私有化後的種種減價措施，往往只惠及工商業消費者，因為他們用量大，比較具有議價力。廣大的個人消費者呢，用量小，又分散，只能由私有化企業予取予攜。英國在把電訊私有化後，監管當局承認，在1990至1995年間，個人消費者所付價格，下跌1%，而商業用戶的卻降了20%。此外，在唯利是圖的原則下，私有化企業很自然會優惠中心地區的消費者（因為用量大）而歧視邊遠地區。瑞典和馬來西亞把郵政私有化之後，首都郵費下降了，但其他地區卻上升了。

私有化並無一利於大眾！我們必須擦亮眼睛，防止繼續受騙上當。

參考資料：

- A Future for public ownership, by Malcolm Sawyer & Kathy O'Donnell, Lawra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99.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by Stephen Martin & David Parker, Routledge, 1997.
Who benefits from privatization, edited by Moazzem Hossain & Justin Malbon, Routledge, 1998.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本文曾發表於〈全球化監察〉2000年5月第五期，這次重刊時有所刪節）

【註釋】

- 1 勞動生產率只計算投入勞動量，但全要素生產率則計算所投入的全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土地等

反社會的「市場」

【劉宇凡】

高官巨賈和主流派經濟學家在推動私有化的時候，總是振振有詞地說，私營經濟在自由市場的引導下能達致資源最優配置，而公營經濟則反。

「檸檬」生意與市場的神話

問題是，即使按照古典經濟學，只有在所謂「完全競爭」的市場下，普遍均衡和資源最佳配置才能在理論上成立。但「完全競爭」的市場只存在於經濟學家的頭腦。一位凱恩斯派經濟學家語帶譏諷道：「完全競爭很完美，唯一的毛病是它從未實現過。」〔註1〕

「完全競爭」的基本條件至少有四點：

1. 生產者數量非常多，每人的供應量只佔總額很少；
2. 所供應的商品之間毫無差別；
3. 有關市場交易的所有資訊都免費而自由獲得（生產者之間彼此完全知道生產價格；消費者完全了解所供應的產品性質及價格）；
4. 各供應商之間不能訂立協議。

單是第3點就不現實。有關任何一個市場的資訊，往往要花錢才能買到，從報章雜誌到證券分析員的報告莫不如此。而且所買到的資訊，往往既不客觀也不中立，就像近年不斷揭發出來，證券分析員多份不會如實反映自己所屬公司的不利消息，甚至在大跌市中還叫人買入股票。

有經濟學家早就指出「資訊不對稱」現象，來說明市場價格往往不像新自由主義學派所說的那樣能正確無誤反映供求的資訊。最早談到這點的是位叫George Akerlof的經濟學家，他從分析「檸檬」生意入手。

一輛二手車質素如何，買家是無從確定的，常常是中看不中用，就像檸檬一樣，看起來色澤亮麗，吃起來又酸又澀。所以二手車的定價一定比應得價錢低，以便補償買家風險。如此一來，好車的賣家就要蒙受損失，而劣車的賣家卻額外獲益。換言之，由於買家與賣家之間對有關資訊的掌握程度大不相同，結果所形成的價格無法公正地配置資源，反而是獎壞罰好。〔註2〕

寡頭壟斷代替自由競爭

至於完全競爭的第一點條件，常識告訴我們，今天的情況基本上是相反的。在許多經濟部門，只剩下幾個巨型企業。自由競爭已經被寡頭壟斷代替。今天

What's wrong with McDonald's?



Everything they don't want you to know.

的資本主義市場不僅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而且是壟斷為主的市場，在這種市場下，少數人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大部份人勞而不獲或多勞少獲。新自由主義常常強調「政府失效」，來為私有化、市場化張目，但事實是「市場失效」也並不少見。市場機制本身就有種種天然缺陷；放任它支配國計民生就必然為多數人帶來災難。

一位富批判性的經濟學家為「自由放任」作出如下總結：

1. 自由放任不能達致全面就業；
2. 自由放任損害消費者主權；
3. 自由放任促進的增長是不對頭的增長；
4. 自由放任在經濟上是不穩定的；
5. 自由放任限制自由；
6. 自由放任造成太大的不平等；
7. 自由放任同民主不相容；
8. 自由放任令勞動者身心受損。〔註3〕

讀者對這個清單不一定要照單全收。但是，經過了泡沫經濟（「不對頭的增長」）、亞洲金融風暴和幾年的經濟衰退和停滯（「不穩定」）之後，在失業率仍然高企（「不能達致全面就業；太大的不平等」）之時，我們是否至少應該承認，上面的清單中至少有幾點是至少有道理的？如是，我們怎麼還能相信市場神話？怎麼能相信，只要社會把近乎一切經濟部門都交給私營和市場調節，就會為所有人帶來幸福的增進？怎能根據一種空想模型去推動私有化政策？

市場萬能論者還故意忽略一個前提條件。說什麼市場能夠最有效反映消費者需求——什麼人的需求？是生存和發展的自然需求嗎？不，祇是「有效需求」！你有錢，你的需求才被承認，才可以叫做「有效需求」；沒錢的需求是不被承認的。不論他們把市場及私人企業精神吹捧到天花龍鳳，都不能掩飾一個事實：私有化就意味有錢才享用原有的免費或低廉用品和服務。例如，水的私有化就表示有錢有水喝，沒錢沒水喝。怪不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喝不起自來水，只能喝污水。



我們並不反對任何市場競爭。如果使用得當，那仍然不失為一種分配資源的好辦法。但是在不加任何限制的市場下，資本家的利潤總是比高，但勞動者的待遇總是比賤，造成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同時，市場的盲目競爭又必然產生週期性危機，這時資本主義的一切內在矛盾就會全面爆發。

資本主義市場的自毀傾向

在工業革命時代，資本家曾經把工人剝削到這種程度：工人未到中年，健康已經壞到連當兵也沒有資格了，這時連最親資本的政府也感到非要限制資本的剝削自由不可了。

美國一位研究工業革命時代的學者Karl Polanyi在他的名著《大改變》中也說：

無限制的市場「對人們生活所造成的可怕後果非筆墨能形容。真的，如果不是後來採取針對性的保護措施，使它的自我毀滅的機制在行動上受到制肘，那恐怕人類社會早就絕滅。」〔註4〕

不是任何一種「市場」都具有上述那種破壞力。如果市場只限於產品和服務的交換，那麼這種市場調節的破壞力就少很多。只有資本主義市場才這樣。它和歷史上其他市場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不單是產品的交換，不單把產品變為商品，而是首次普遍地連人的勞動力也變成商品。南極的另一面是北極。勞動力的商品化的另一面就是資本買入勞動力的使用權的自由，就是資本的剝削自由。不僅是資本剝削工人的自由，同時也是大資本剝削小資本的自由，於是小資本紛紛破產，大資本發展為壟斷資本及其最新形式——跨國公司。在這晚期資本主義，壟斷資本甚至凶惡到連地球生態也要剝削淨盡。

但是這種瘋狂剝削最後一定導致人類社會的解體

和自相殘殺。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走向惡性競爭，經濟競爭走向政治和軍事競爭，再進到全面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的禍害已經史鑑昭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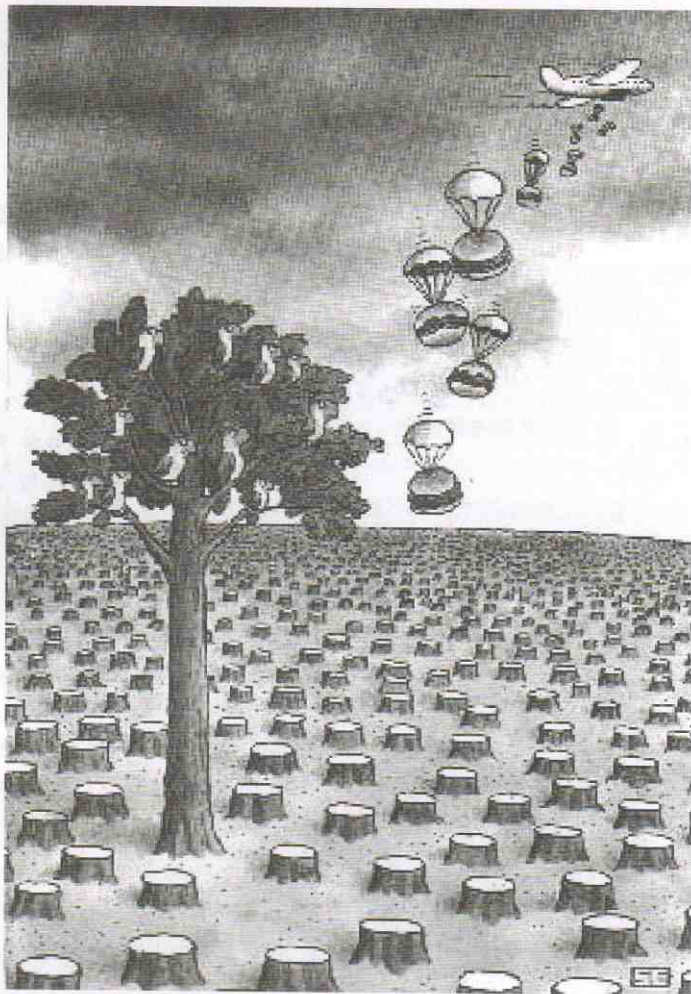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統治階級的開明派一方面在世界工人運動以及蘇聯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下，另一方面自己也多少吸收了三十年代大蕭條、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世界大戰的教訓，開始實行「有管制的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這也就是Karl Polanyi 所說的「制肘」，指的就是對資本剝削自由的限制，例如八小時工作制立法，其他勞權立法，福利國家，資本管制等等。如果香港人在過去幾十年生活較好，部份原因正是因為香港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放任」，而是對市場有一定程度的限制——當然比西方低許多，但畢竟有多少限制。香港法律上有過租金管制；大規模興建公共房屋則在實際上減少了私營房屋的市場份額。公立教育和公共醫療同樣保障了多數公民的人文發展的機會。

所以，現在那種要取消一切市場管制，要把公營部門私有化的「改革」，其實都是假改革，真改衰，代表的是社會的倒退而非進步。如果要吸取什麼歷史教訓，第一個歷史教訓就是，我們應該承認小生產者交換產品的自由，但是不能給予壟斷資本任意剝削的自由。它的剝削自由越多，小資本和勞動人民就越沒有自由，生態環境就破壞得越厲害。這是毀滅人類和地球的捷徑。

2003年9月25日

【註釋】

- 1 《經濟學》，薩繆爾森著，商務印書館，1981年北京，上册，62頁。
- 2 Wall street, by Doug Henwood, Verso, 1998, P.172
- 3 Against Capitalism, by David Schweick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43.
- 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Beacon Press, 1957, P.76.



私有化還是社會化？

【劉宇凡】

公屋管理私營化，社會福利私營化，連郊野公園燒烤場也要私營化。不如連空氣和海洋都私營化吧！

「凡是能夠分割的就應該出賣」

這時我們的新自由派經濟學家就會耐心解釋：

「不，我的朋友。市場的確是最好的資源分配機制。但是我們不會全部否定公營部門。根據我們的經濟學，客觀上存在所謂公共用品，例如國防、警政、司法、行人路等等，一般都應該公營，因為既然無法衡量出每個人使用了多少國防和警政的服務，就誰都想搭便車，不想自己花錢買，這就無法形成有關服務的價格和需求曲線。反之，凡是能夠衡量個人用量的用品，就意味著可以形成價格和需求曲線，這時就該私營。小政府，大市場，這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這不過是說，凡是能夠分割的就能夠出賣，凡是能夠出賣的就應該出賣。怪不得外國政府現在連垃圾收集也要按各戶的垃圾量來收費。如果有一天在技術上能夠做到用很低成本來計算每個行人使用行人道的「量」，那麼，行人道也應該私營，按量收費。凡是可以收費的，就應該收費！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經濟科學」了。

任何有正常頭腦的人都不難知道上述的推論完全不講邏輯（至於什麼「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分配機制」論，我們在另文批評）。凡是資本家都有錢可捐。那是不是說，資本家非捐不可呢？

新自由派經濟學還有更大的錯誤。它的整個理論

都建築在這樣的假設上：每個人都是孤立的、純粹自利的經濟動物。這一假設徹底錯誤。恰恰相



反，當代社會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各方面都是高度社會化，每一個人和每一個經濟部門以至政治及文化領域，都息息相關，互相倚賴。所以要解決任何社會和環境問題都要從這個前提出發。從相反的前提出發恰恰是在助長資本主義的自毀傾向。

最近香港政府也在考慮垃圾收集實行收費，貫徹「污者自付」的原則。污者自付，多麼天經地義！怪不得香港環保團體都舉腳贊成。然而，為什麼家居垃圾越來越多？純粹因為個人的私德問題？

污者自付——誰是污者？

不。做為一個當代消費者，許多家居垃圾都不是他個人製造的，而是生產商和分銷商硬派給他的。他不要也得要，而且還要付錢買下垃圾：

「資本家為了誘使你買他的產品，光是廣告是不夠的，還需要漂亮的包裝。英國1992年一項調查表明，人們在超級市場，每花7.5鎊購物，有一鎊是作為包裝成本的。在美國，50%的用紙量，90%玻璃瓶，11%鋁及3%的能源是用在包裝上，其中許多本是不需要的。這些包裝所造成的垃圾佔城市垃圾的一半。」

「跨國公司為了刺激銷售，往往有意縮短其產品的壽命。在著名劇本《推銷員之死》中，男主角抱怨：你用分期付款買下電器，但是在你付完款之日，往往便是你的電器壽終正寢之時。一般汽車的發動機只有十多年壽命。其實，以同樣技術及成本，早就能製造出平均壽命達30年的發動機。但汽車公司不為。當然啦，否則你們怎會經常換車？不過，資本家發了財，整個社會及環境卻遭殃。廢車早就成為另一種現代社會的公害。」

〔註1〕

可見，消費者個人絕對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的消費行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銷售、經濟、政治等等千絲



萬縷的相互關係的產物。他的家居垃圾越來越多，但他個人的責任很小，主要責任應該在生產商以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上面。主流經濟學家把當代社會的個人想像為純粹孤立的經濟人，根本是空想。不過，就像神棍推銷他的種金術一樣，這種空想不是為自己消費，而是為推銷對象消費的。一旦經濟學家推銷成功，他們這種空想便變為很實際的利害——人人付費給私營清潔商，換言之，人民手中的錢少了，資本家的利潤多了。

新自由派這種把地球上一切瓜分、出賣的主張，不光使普通人和自然生態備受剝削。還有更大的害處呢！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資本主義經濟同過去的一切經濟體系不同的地方，就是整個生產、交換和分配都高度社會化。一件產品要經過許多經濟部門和許多人手，才最後消費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仍舊歸少數大資本家所有。這種制度既造成了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也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在危機時候，大資本家的應付辦法，就是進一步擴大他們的私有權，把原先屬於公共領域的用品都變為他們的商機：把公共房屋私有化吧！把食水私有化吧！把空氣私有化吧！這種進一步擴大財閥的私有權的辦法，其實是飲鴆止渴，因為這樣只會進一步破壞生產社會化的內在聯繫，把社會推向經濟瓦解和混亂。英國鐵路的私有化完全遵循新自由派經濟學的教誨，凡是能夠分割的就分割出賣，於是把鐵路和車廂分拆出售。私營鐵路公司和私營的車廂公司，雖然像教科書中所說的各自追求利潤最大化，但這種追求結果並沒有像教科書中所說的、帶來了整體的幸福，相反，帶來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交通災難。無他，因為兩間公司各自為求利潤最大化，就各自降低安全標準；鐵路公司常常用過期的零件，車廂公司常常用過期的

車廂，結果鐵路和車廂在技術上越來越互不配合，越來越不安全。

今天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早就不是那種個人的私有制，那種由資本家親力親為的小企業制度。任何一間跨國公司，股東數目少則十數萬，多則上百萬。這種私有制本身就具有集體性。只不過這種集體性呈現得特別畸型荒唐罷了。在資本主義法律下，一個大股東往往只需要佔有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成或兩成的股權，就能實際控制公司。一案小股東所持有的那張股票，不過是一張分紅憑証而已，他對公司的決策完全沒有影響。所以，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祇是一種讓大股東把小股東的集體財產實際變為自己的私人財產的把戲罷了。近二十年這種把戲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由銀行家和保險公司控制和借以發財的各種各樣退休基金、醫療保險基金、互助基金等等，都是那些大老闆自己的錢嗎？不，都是別人的錢，特別是中下階層雇員的錢。所以他們再追求什麼私有化，其實就是把更多的社會財富裝進自己口袋。

普遍的社會自治

普羅大眾當然應該反對私有化。可是，今天這種反動倒退的浪潮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壟斷資本的私有產權、同社會化大生產的趨勢的深刻矛盾所必然產生的。所以，除非根本解決了這個矛盾，否則，即使人民能夠暫時阻止私有化，不久之後它又一定捲土重來。所以，祇有拿出社會化的鬥爭方向，才能真正有效抵制私有化。所謂社會化，就是把主要的生產工具的所有權都歸社會共有和民主經營，直接為滿足全體人民的生活需要而生產和分配。也就是說，除了要實行政治民主之外，也要實行經濟的民主，確保社會和自然的最重要資源的使用和分配，都由全體公民主

主決定。如果把世界上一百個最大的基金和一百家最大的跨國公司收歸社會所有，那不過是把社會的財產從幾百個大家族的壟斷資本的手中交回給社會罷了。

有人反駁說，整個經濟體系由社會上千百萬人共同擁有和共同管理，這怎麼可能呢？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做到了一大半。資本主義大企業早就是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無論股東有多少萬人，也無論職員有多少，都不妨礙數量少得多的專業經理人負擔日常的管理工作。社會化的企業不過繼續發展這個歷史趨勢罷了。其次，社會化的涵義就是高度的社會自治，意思就是：哪一種經濟決策影響到哪些人，就由哪些人自己進行民主決策。凡是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戰略的決定，例如定下國民收入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經濟部門的綜合平衡，宏觀調控的基本規則，新經濟部門的發展等等，由於直接影響全部公民，就應當由中央一級民選機構作決定。至於大型的社會化企業，管理權歸職員自治委員會所有，但必須吸收一切利益攸關者參加管理，這包括來自社區、消費者、環保團體等等的代表。社會化企業除了在新的投資上需要同整個行業以至中央機構商量協調之外，在日常管理上應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中小型的企業則盡量鼓勵職員創辦合作社，並享有比社會化企業更大的自主權。社會上各種經濟實體，在內部盡量實行民主管理，而彼此之間則盡量通過民選政府、計劃協調和市場機制三大元素來協同發展。這是一種經濟戰略適度集中，經營管理盡量分散；大民主和不同層次的小民主互相配合的社會自治。根本不會出現那種千百萬人一起去管理一個小企業的荒唐現象。

今天巨大的生產力和種種通訊技術的革新，特別是互聯網的誕生，足以讓這種真正的民主制度在技術上行得通。如果到現在還沒有實行，不是因為物質上做不到，而是因為大財閥及其政府抵抗而已。

社會化與私有化的比較是雲泥之別，而且也比過去的國有化優勝很多。過去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國有化，正正因為沒有同時實行政治和經濟的民主，所以國有企業就像國家機器一樣，根本不受人民監督，因此不是變成準商業機構，就是變成官營，即使它有時比私有化稍為有利於普羅大眾，但畢竟已經變成特權階層的禁臠，所以難免腐化。

這樣重大的社會改革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

各種社會運動在長期的局部鬥爭中鍛練自己的力量，才能有一天強大到實現這種變革。長遠的眼光必須配合著現實的局部鬥爭。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社會化的起步點，就是逐步加強限制壟斷資本的剝削自由，同時大大增加雇員、社區、消費者和一般公民對它們的民主監督權。其他過渡的措施可以包括：

1. 廢除私有化政策；逐步縮小而不是擴大資本經營的範圍；
2. 基本民生用品（食水、能源、住房等）以及醫療、教育等，按需要分配而不是按支付能力分配；
3. 管制跨國公司的自由流動；
4. 制定反壟斷法；對壟斷利潤課徵重稅；
5. 大企業的帳目完全公開，使民間團體可以密切監察；
6. 大企業的重大投資決策要由民選機構監督；民選機構由雇員、消費者、社區等等代表組成。

關於這個議題，近二十年來在外國已經有很多討論。這篇小文章不過是對這些討論作出的初步歸納。讀者有興趣探討的話，可以參考下面的書目。

2003年10月9日

【參考書目】

1.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by Michael Albert, Verso, 2003.
 2. An anti-capitalism manifesto, by Alex Callinicos, Polity, 2003.
 3. Market Socialism-----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8.
 4. Against Capitalism, by David Schweick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Against the Market, by David McNally, Verso, 1993.
 6.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by Alec Novc, Allen and Unwin, 1983.
 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by Branko Horvat, M. E.Sharpe, Inc., 1982
 8.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by Ernest Mandel, New Left Review, No. 159, p.5-38.
 9.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by Ernest Mandel, New Left Review, No. 169, p. 108-21.
- （3,4,6,7四本書，都有大陸中文譯本，惟譯文多欠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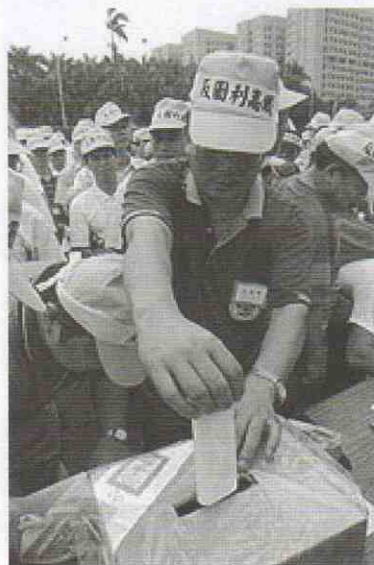
【註釋】

1. <垃圾的誕生>，劉宇凡，<全球化監察>第8期，2001年1月。

由本港多個民間團體（包括全球化監察）和工會組成的反全球一體化組織——全球聯陣，今年九月趁墨西哥世貿部長級會議期間，先後兩次遊行前往香港政府總部抗議，反對世貿官商勾結，並要求特區政府代表不要在「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談判中作出承諾。如有興趣參與全球聯陣活動，可聯絡聯陣的幹事郭仲淦：6150 0364



就在世貿會議前夕，台灣鐵路工會發起了反對鐵路私營化大集會，八千多會員戴上不同顏色的旗子、帽子與布條，上面印著「反公司化」、「反民營化」、「反圖利高鐵」、「反消滅台鐵」的口號，配合上聲援團體的旗幟，現場氣氛熱烈，彷彿一場工人的嘉年華。台鐵工人抗爭將有力抵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有興趣讀者可看反私有化論壇網 <http://www.cool.loud.org.tw/antipriv>



補購

歡迎補購

《全球化監察》

以往各期

全球化監察各期專題：

- | | |
|-----------------------|-------------------------|
| 1. 什麼是全球化？（1999年9月） | 9. 糧食（2001年1月） |
| 2. 世界貿易組織（1999年11月） | 10. 婦女（2001年3月） |
| 3. 全球化不是千禧美夢（2000年1月） | 11. 生命工業（2001年5月） |
| 4. 號外：回望西雅圖（2000年1月） | 12. 工作（2001年7月） |
| 5. 反思資訊科技（2000年3月） | 13. 反全球化運動與反戰（2001年11月） |
| 6. 私營化（2000年5月） | 14. 中國入世（2002年2月） |
| 7. 社會福利（2000年7月） | 15. 超級市場、超級壟斷（2002年7月） |
| 8. 垃圾（2000年10月） | 16. 旅遊（2002年12月） |

如想購買請列明補購期號及數量，

連同小面額郵票（每本連郵費\$6）

寄到：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797號。

你也可以到監察的網站下載各期文章。

網頁：<http://globalmon.uhome.net/>